

江海怒潮

第三集

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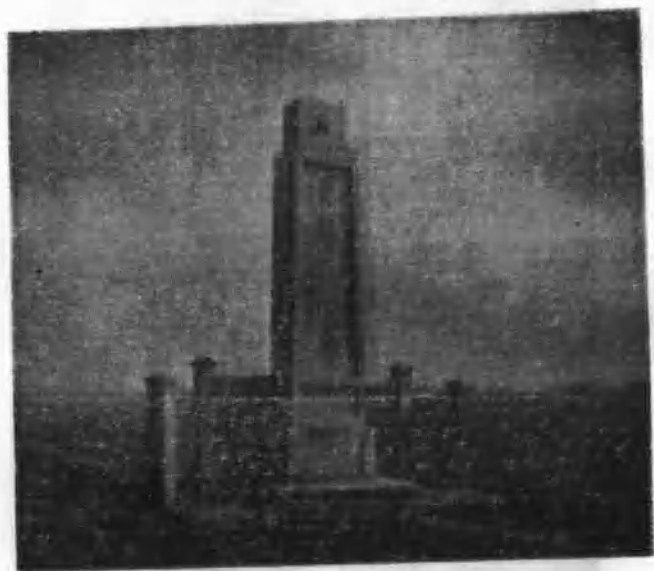
第1辑
第2辑

目录

中共海门县委党史办公室



黄火青同志来信



黄火青同志为秦超烈士墓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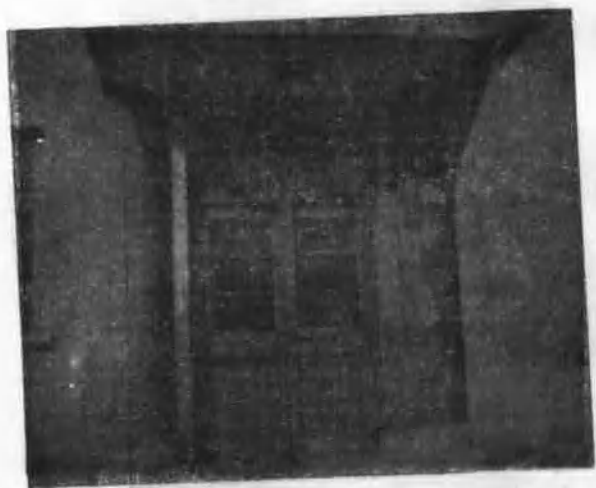
红十四军使用过的大刀



红十四军使用过的小炮



大生三厂钟楼



大生三厂搜身门



大生三厂公司厅



王浩乡原参加过红十四军活动的老同志
座谈会留影

前 言

《江海怒潮》第三集，现在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一集，主要收集有关我县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部分文献资料、回忆录、专题史料和战斗纪实等。

我县东临黄海，南接长江，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隔江相望，水陆交通便利。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在上海诞生并召开了“一大”，从此，中国革命斗争的洪流巨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逐步波及大江南北，波及全国各地。江海平原上的广大民众，长期以来，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和剥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不断发生着自发的工人、农民、学生斗争以及其他阶层的革命斗争，所有这些，实际上为不久熊熊燃旺的革命巨火，准备了干柴。

在中国共产党未直接来到海门地区活动之前，我县广大群众反封建、反资本家的斗争不断发生。大生三厂工人罢工，通海垦牧公司的农民运动，海门中学、海门师范的学生运动，以及其他各阶层的群众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这些斗争是我县整个民众革命斗争的一个缩影，它对唤起群众起了十分深刻的作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缺乏先进的革命政党的领导，由于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加上广大民众的觉悟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这些斗争最后都归于失败。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开始，在上海川沙从事教书职业的共产党员张冠今，回到海门西乡的三和镇横板桥家乡，积极着手建立和发展中共党组织，并开展革命活动，播下了最早的革命

火种。

一九二七年春，南通县东部五区（现属海门北部地区的八个乡），在旅沪学生俞海清、唐楚云等的组织和发动下，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开展了群众斗争。从此，我县人民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这本集子，就是从一个个侧面记述这场斗争的生动史实。

在史料的征集和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县委和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指导，得到许多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得到有关部门的配合和海门县彩印厂广大干部职工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加本集编纂和校对的有俞茂林、王凤生、梁玉宏、薛汉昌、施勇石、张乃兵、徐彦伦、俞中流诸同志。由陈必信同志作了文字上的润色。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一定难免，望提出批评意见。

一九八五年三月

关于红十四军的回忆

黄火青

我在红十四军的三个月，正是立三路线统治党的三个月。我和秦超同志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底回到上海，中央指示我俩到江苏省军委分配工作，省军委书记石心（又名李硕勋）安排我俩去南通红十四军工作。去之前，由军长李超时同志，参谋长黎时中同志在上海大中华旅馆五楼开会，刘瑞龙同志也在座，交代任务和工作。秦超任红十四军一团团长，我任政委兼参谋长。该团任务是占领金沙，进攻南通，切断长江，响应南京暴动。会后，由余锡合（本名俞金秀）陪同，交通俞三、俞四带路，坐船到海门大新港上岸，进入通海游击区。

我们新从苏联回国，对当地情况不甚了解，部队游击习气较重。人数多的时候有二百余人，少的时候一百七、八十人，都是拿的手枪。凭这样的实力，要去夺取敌人有一个团兵力防守的金沙是不可能的。当时，如正面提出这种观点，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曾转弯抹角地说，部队需要打些小仗，积累经验，以提高士气，当即被党委领导顶了回去。于是，马上领着队伍，沿途号召，去打金沙，时间在某日午后，但中途遭敌人伏击，我们溃逃。记得刘瑞龙同志亦在场。之后，某天白昼，曾向汤家圩反动武装发动过一次进攻，未成功，一伏战士手腕受伤，又没过几天，我们部队在某地吃过午饭休息，据报有敌情，部队转移时，又遭敌人伏击，秦超同志不幸牺牲。以后，我们决定消灭小股民团，采取夜间袭击，先打郁家土地堂，打是打进去

了，但未消灭敌人，我负伤了，经凤凰桥，由一个小学校长找了乡间的一个西医，给我包扎并敷了药，抬到岸头镇南交通张三麻子家里，后来又转移到何家园一个姓姜的老百姓家里。九月二十六日，我由交通俞四送回上海。在负伤回到上海之后，听说，部队消灭了一个小民团，接着来了一次开往启东久隆镇，企图与红十四军三团会合的远距离的冒险行动。南通敌人沿公路坐汽车追来，我军遭到重大打击。

我在南通、海门地区期间，一般多是昼伏夜行，和群众接触很少。记得在岸头镇群众赶集时，曾向群众作过一次宣传。立三路线时期，党团群众组织一概取消了，合并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我从战斗生涯中感到，由于党的长期工作，群众和党的关系是很好的。我们部队到谁家就吃谁家，打仗时经常穿着衣服过河涉水，衣服湿了，到谁家就换谁家的衣服，完全和自己人一样。我负伤后，帮我医治。遇到敌人来扫荡，群众总有人来，把我安置到隐蔽的地方。当时生活是很艰苦的，吃饭多半只加点芋头，有时到水渠中捞些螺蛳（本地人叫作玉肉）洗净在开水里泡过以后就当菜吃。物质生活虽苦，但精神还是很愉快的，手里拿着武器同敌人作斗争，总比在上海时躲躲藏藏的要好。

当时由于自己缺乏游击战的经验，打仗只凭革命热情。假使当时领导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情况可能就是另一个样了。

注：

1、黄火青同志于一九八四年七月一日给南通市委党校黄一良同志写了一封信，谈他在红十四军中的情况，后我办去信向黄老征询有关情况后整理成文，寄给黄老。黄老又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亲自作了修改和补充。

2、秦超同志牺牲经过和时间上，另一说是，一九三〇年五

月二十日三打汤家圩这天，秦超在大高桥打三余增援之敌而牺牲。

3、秦超任红十四军一团团长。据我们了解，秦超同志来通东后任红十四军二师师长之职，因当时二师下面没有团的建制。

回忆我在海启地区活动的经历

徐云翔

我叫徐云翔，原名徐凤翥，化名黄季平。解放以后全家居住在上海市金山县漕泾镇南街，从事教育工作。我出生在海门，自幼在海门西部的通海镇外祖母家长大。

一九二九年夏，经南通县北兴桥区委书记沈连宾介绍，我结识了南通县委林志和同志。没几天，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掘港东华丰公司附近沈连宾家里举行了入党仪式，会后沈连宾要我回去把当地农民组织发动起来，开展减租斗争，并嘱咐说，“过几天如皋方面派党员来找你。”我回去后，即在华丰公司发展了一批人。可是等了几天不见来人，我就赶到沈连宾那里请示，不料沈已牺牲。我再去找林志和又未找到。因海门情况比较熟悉，我就决定回海门发展组织。在海门茅镇碰到了潘百型，由他带领四、五个人，六七支枪，和我一起到华丰公司去开展武装斗争。这样，我们又来到了华丰公司。在一九二九年冬季的一次战斗中，有位同志光荣牺牲，另一个姓施的被捕后叛变，出卖了组织，我家因此也被查封，我的母亲和妹妹被敌人捉去，我还受到通缉。

我逃亡到海门西乡通海镇外祖母家，化名黄季平。不久，经海门朝阳镇的共产党员赵洪兴介绍，去上海建南中学（原麦根路10号）读书。这是一所共产党创办的进步学校，在学校里我们经常上街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抗议敌人的法西斯统治。不久，校长遭反动当局逮捕，学校被查封，我只好失学回海门。

一九三〇年初，我找到了在海门西乡三和小学教书的赵洪

兴同志，他又把我介绍到中共海门县委的王兴宇同志处。在王兴宇的领导下，我们在海门茅镇索首的通源镇租了一间房子，我和海中学生龚礼和（原先参加革命，叛变后在上海松江县当了特务，后被茅理枪决）及其他几个同学住在里边。经常印传单，写标语，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是年冬季，王兴宇把我介绍到周趾麟同志那里。在几个月时间里，周趾麟和我在海门中学、三厂、常乐镇分别建立了党小组。海中党小组中有陈景如、蔡如山、沈志祥、龚礼和、吴开礼等。三厂党小组交给黄冠球、杨祖梅领导。我在常乐镇东八桥党小组参加活动。同时，长兴、长来、麒麟、癩巴镇内部相继组织起党小组，但未曾宣布。

一九三一年秋，在长来镇沈士成家，召开了第一次启海县委会议。县委成员有：书记周趾麟、组织委员许惠高，宣传委员王福基（王吉人），秘书王承谟（即王尘无），共产主义青年团（CY）书记施廉（化名小方，三四年投敌，解放后枪毙在上海），我以宣传干事的身份列席会议。会上周趾麟同志讲解了我们党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时隔不久，许惠高和王福基先后调到江南工作（后他们都成了叛徒），我去南通，在南通中心县委书记黄家骏那里受调了一个星期。

一九三一年冬季，召开了第二次启海县委会议。会上决定我任启海县委宣传委员，徐宝珍任组织委员，蒋志轩为秘书，接替王承谟的工作，安徽人刘志成任军委委员。

一九三一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发动群众组织了“民众反日会”（简称民反会），到三二年春建立了“民反会总会”，地点设在常乐镇国民党区公所，由我负责。另外有党员黄冠球、杨祖梅和非党人士张根照三人任执行委员。我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散发传单，大造舆论，掀起一个反日高潮。

四、五月间，为了更好地开展游击活动，县委决定惩治一批罪大恶极、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恶霸，以便扩大政治影响，增强人民信心。首先由刘志成、周趾麟与沈士强等人镇压了连元镇南边的恶霸地主陈元方。五月十日前后又去麒麟镇东南的季丕成家搞经济，结果未遂。就在第二天，我们派游击队员顾朝献（连元镇人，木匠）去麒麟镇探听消息。他一到镇上，就被季丕成家的佣人认出，暗中密告了区公所，顾朝献随即被逮捕。顾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县委的联络地点。当晚敌人包围了癞巴镇沈士强家，县委书记周趾麟、军委刘志成、大队长沈士强及其父沈志道、其弟沈士彬，队员陈民才、顾连生、邵丕成等八人被捕，押往海门茅镇。同时被抄去七支短枪和一部分弹药。

“癞巴镇事件”以后，南通中心县委书记黄家骏同委员陈俊（王梦祥）来到常乐镇西边的一个农民家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到会的还有蒋志轩、徐宝珍、施廉和我。会上黄家骏回顾和总结了斗争情况，特别指出由于我们警惕性不高，致使癞巴镇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必须从中吸取沉痛教训。会议决定开除危险分子高伯良，组织营救委员会，设法营救被捕的周趾麟等同志，并决定派我去启东负责具体事宜。

由于周趾麟是敌启东县政府早已通缉在案的要犯，一九三二年六月份从海门押到启东，关在县中队部。刘志成等几人由于被镇压的恶霸地主陈元方的家属叮得紧，被解到镇江军法会审处，除沈士彬、邵丕成两人释放外，其余五人后均在镇江被杀害。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我乘汽车到启东去，组织上派陈泰康同志护送我。陈在启海汽车公司投股并兼帐房，党内是“互济会”的负责人。由于汽车一再出故障，天又下着小雨，到